

# 臧否清華

## ——來自老清華刊物中的另一種聲音

● 張玲霞

在老清華時期(1911-1949)發行的《清華周刊》、《清華副刊》、《清華文藝》等校園刊物上，很多文章在議論着清華的方方面面，有的從正面去體會她的優勢，有的從側面去發現她不盡如人意之處，也有的從反面挖掘她的缺漏。臧否互見，錘煉出獨特的清華精神。

### 一 自強不息的清華校風

1914年，梁啟超來清華作題為〈君子〉的演講，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來鼓舞激勵同學，從此「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成了清華校訓，也成為了清華的精神。清華，是建立在「中國四萬萬同胞以往的體面和四萬萬同胞幾十年的負擔」(梁啟超語)之上的，當時的學生，尤其是享受庚子賠款、將來要留學美國的同學，無不懷有沉重的心理負擔和對於責任的清醒意識。檢點、完善自我，批評、激

勵同伴，監督、修正校風，成了每個清華人的自覺。

王造時同學的〈清華校風的蛻化與批評〉<sup>①</sup>，全面分析了清華三年多來的成績與失誤。他將自己入學以來的清華劃分為五個時代：一、專制時代：學生「視校長如天皇，見齋務長如閻王」，學校秩序整齊井然，其弊端在於「把學生的個性消滅無餘，養成一班做奴隸的人才」，這是機械式的被動的教育方式。二、陵夷時代：學生受「五四」運動的影響，「朝氣勃勃」，由服從的校風一變而為革命的校風，進而終於驅趕校長。三、革命時代：對於以往的校風開始懷疑，要求改革，校長離去，處於無政府狀態，然而學生很有團體觀念和自治精神，校風尚好。四、過渡時代：嚴姓校長代理事務，熱心而尊重個性，重精神而不重形式，尚學問而不尚空言。五、混亂時代：新校長執政，熱情有餘，情況生疏，舊的校風推翻無餘，新的校風無從建立，所謂青黃不接時期。作者指出，不同的時代

1914年，梁啟超來清華作題為〈君子〉的演講，從此「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成了清華的校訓和精神。梁氏又說清華建立在「中國四萬萬同胞以往的體面和四萬萬同胞幾十年的負擔」之上的。因此檢點、完善自我，批評、激勵同伴，監督、修正校風，成了每個清華人的自覺。

當時身為學生的王造時在〈清華校風的蛻化與批評〉一文中，將自己入學以來的清華劃分為五個時代，不同的時代有不同校風：專制時代是服從的校風，陵夷時代是懷疑的校風，革命時代是破壞的校風，過渡時代是試行自治的校風，混亂時代是無治的校風。

造成不同的校風：專制時代是服從的校風，陵夷時代是懷疑的校風，革命時代是破壞的校風，過渡時代是試行自治的校風，混亂時代是無治的校風。

〈清華底成敗與中國底安危〉<sup>②</sup>是1924年梁啟超在清華的談話錄，他講了兩方面的內容：清華同學應有的根本覺悟，留學美國應注意的三件事。他說，清華學生享受的是全國父老兄弟的脂膏血汗，那麼對於全國人民就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給國家真正做一番事業，給社會真正謀一些福利。留美時要注意：一、立志做學科裏的第一流人物。二、針對中國的國情，有目的有鑑別地學習，學以致用，不能盲從。三、保持自己的民族尊嚴和民族精神，完善作為中國人的人格修養，為了將來服務於祖國。梁啟超認為，將來中國的安危，很大一部分成敗取決於清華人的努力，他發出這樣的呼喊：

清華學生呵！你知道你所享受的特殊機會是四萬萬同胞的脂膏所造成的麼？

清華學生呵！你知道你肩上挑的擔子是有四千年文明有四百萬里土地的國家底安存和四百兆父老兄弟姊妹底生命的幸福麼？

清華學生呵！你知道清華的成敗與中國的安危有着密切的關係麼？

賀麟的〈新同學新校風〉<sup>③</sup>是對新同學提出的希望：首先，不要把外間的壞學風帶到清華來，諸如：政客式的學風——學校政治化，動輒糾眾暴力，搬弄是非；買辦式的學風——目光專注於金錢，不是為國家而學

問、為做人而學問，而是為飯碗而學問，求學、交友、處世都帶有營業性；教徒式的學風——教會學校不是信仰自由，而是人人信教，宗教與學問打成一片，雖未必個個當外國人的爪牙而喪失國民性，但可能性總更高些。他認為，第一種必具的新校風是刻苦自責的校風；第二種清華所不可少的就是目光遠大的校風。這兩種新校風的創立，既可以擯棄目前的弊病，又暗合舊時的道德。

一所學校的校風也就是一所學校的精神體現，它是動態的。自強不息、平實嚴謹的清華校風也不斷地被時代的發展推動着，與社會人生有了更為密切的關聯，胸襟也更為開闊。郝御風在校慶二十周年（1931）寫的〈清華之紀念〉<sup>④</sup>中，用富有詩意的話語指出：清華因了學術的使命而生存，這是清華生命的基石。然而，在一個科學務實的社會裏，應該再給它一個心靈，「清華需要一個更開展的心靈，來配合它哲學般的環境。」確實，學校教育的成功，決不在知識的分布，而在於心力的開拓，應使每個心靈成為一切知識的主宰，而非僅主宰於知識！使嚴肅而寡恩的科學人生，得絕對的自由而美化，這樣，清華才能真正地走入現代生活的境地。

清華校風就是這樣在不斷地堅持、弘揚、充實、修正。這些臧否校風的雜文，總的來說都是有大家風範，有的也許情緒過激，有的也許觀點偏頗，但無不一腔熱忱，滿懷衷腸。正因為有如此輿論的監督，清華幾十年來的校風大致行於正軌，並且能夠與時俱進，與日同新。

## 二 德、廉、美兼備的教育理念

談到具體實施的教育，清華的方針與制度一直受到來自學生的多方面挑戰。被教育者的感受是最直接最深切的，有所謂「切膚之痛」，假如沒有開闊的胸懷，是容易流於主觀片面的。但老清華的學子沒有為個人好惡所局囿，能夠理性而體貼地為清華的教育事業出謀劃策，想方設法。當然，褒貶很分明。

第一，用積極的方法完善道德教育，反對刻板的懲罰方式。

當年的清華學生，入學時相當於進中學的年齡，各方面都沒有定型，他們不但要學習文化知識，也需要進行性情培養、人格建造，正像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愛彌兒》(Émile)中所說的，首先要讓他知道如何做人，然後才告訴他該做怎樣的人。於是，用甚麼樣的方式來塑造他們，有了爭執。

〈清華德育之回顧與今後之標準和實施〉<sup>⑥</sup>是陳銓針對德育問題而發表的文章。他認為，大家都覺得清華的德育不完善，亟待改進，但「德育」是一個空泛的名詞，並非籠統地疾呼「注重道德」、「道德重要」就能夠解決的，更不是增設幾條管理處罰條例就可以收效的，而應找出歷來清華德育的成功與失敗的原因，研究近來教育的趨勢，求出清華學生應有的道德標準，使之有所遵循。為此，他用兩句話來概括清華德育的歷史：「五四以前，取干涉主義；五四以後，取放任主義。」他提出的中心觀點是循循善誘，積極引導，信任而不放任，鼓勵而少懲罰。他還呼籲學生努力向上，不能僅僅依賴

學校的盡責，還要潔身自好，自我完善。

假如說陳銓的雜文是以理服人的話，代中的〈我心目中的真教育〉<sup>⑦</sup>則是以情動人。他說，我們四千年的歷史唯一僅存的碩果就是德教了，國民在不知不覺中講禮儀揖讓。近來，中華的子孫卻爭攘不休，見利忘義，這是教育不良的後果。來到清華的學子都不足十六歲，正是受教育的關鍵時期，也是人生最危險的時代：知識半開通，獸性又尚未退盡，「引他們上正路很容易，引他們入壞途更不費力」，教育的環境十分重要，教育方法選擇尤其不能馬虎：「管教」的強迫方式效率很微弱，它會引起學生的反抗。「育化」才是有效的手段，它「徐引慢導」，可以「勤學息欲，鍛身煉性」，既保持他們的「善本」，又剔除他們的「惡根」，使之一天天與德義接近。而我國現時的學校教育，無論初級還是大學，多半取嚴厲管束的手段，比如清華，「二百九十九個學生，就有那麼多管理我們的機關，壁壘森嚴，望而生畏」，收效甚微。培養學生的好習慣才是出路。

署名華的文章〈清華教育的兩層缺點〉<sup>⑧</sup>更是直截了當地批評清華當局對學生品格訓練的忽視。「齋務處所做的是，只是消極的管理。他的責任，只是消極地監督學生不去為非，並未積極地引導學生孳孳為善」，這使得學生大都過着平庸的生活，糊塗塗塗，「全無內心的修養，全無遠大的志向。」清華教員對於學生多數只取一種「商人對於買客的態度。他們好像只為薪金而來賣學問的，在課堂中把他們的學問交清了，便算完事」。他認為，要「因人而異其教」，規勸加勉勵，這樣才能真正訓練提高學生的品格。

代中在〈我心目中的真教育〉說清華「二百九十九個學生，就有那麼多管理我們的機關，壁壘森嚴，望而生畏」，收效甚微。署名華的文章則批評清華當局「並未積極地引導學生孳孳為善」，教員對於學生多數只取一種「商人對於買客的態度。他們好像只為薪金而來賣學問的」。

清華課程的緊張歷來是有名的，朱湘這個未來的著名詩人，當時就視課程為「催命鬼」。他的〈課程上前車之鑑〉一文劈頭就大聲喝問「課程有用嗎？」他最難以忍受的是「課程將一個人的時間一齊霸佔住，使一個人的創造力無發展的機會，在這點上課程實在是罪大惡極」。何鴻烈則呼籲學生不要把自己當作「分數的孝子」、或「籠子裏面的鳥，車子前面的馬，田裏的耕牛」。

第二，提倡精神教育，培養自覺的人格，反對「奴隸式的整齊」。

幾乎從清華創辦起，就不斷聽到聲音批評它過於嚴肅機械、循規蹈矩的教育模式，一所學校不能沒有紀律，但也不能沒有精神的自由和個性發展的空間，圍繞這個問題的雜文為數不少。

何鴻烈的〈清華當局和學生應有的覺悟〉<sup>⑧</sup>一文也反對被動、消極的教育方法，主張喚醒學生的理性和自覺，使之達到精神的滿足，進而貫徹教育的宗旨。他認為清華已有的教育方式是「因襲的，無生氣的，沒有尊敬心的」不自然的形態，「教師單只顧念考試和文憑等，把學生自然的，純潔的，或潛伏的知識欲望摧殘盡了」，把教育看作「訓練生活術」的手段，使學生從純粹功利主義的觀點去估量知識，把知識當作金錢的敲門磚或出洋的工具，而不是智慧的門徑。作者特別強調尊重和發展「真的生命」——天賦的人權與自由、人的本能和自覺、活潑的思想與舉動。他呼籲學生不要把自己當作「分數的孝子」、或「籠子裏面的鳥，車子前面的馬，田裏的耕牛」，「人一到了自覺，才會尊重自己的人格，才會自立，自助，自愛，自治」，才能夠主動承擔道義和職責，獲得精神上的進步。

朱湘以詩人的氣質特別提倡美育，他的〈精神教育〉<sup>⑨</sup>一文認為，教育的目的有兩項：一為入世的，主應物；一為出世的，主審美。出世的教育就是精神教育。美育是精神教育必不可少的。美術教育應「選擇古今中外之名畫時常開會展覽，以引起大家審美的趣味」；音樂也應該有特別班，「一授西樂，一授國樂。國樂應聘請國內之音樂家將我國詩歌入譜，

這樣不僅我校得益，全國都要被惠呢。」文學「乃宇宙人生的真理之藝術的具體表現」，它與美術、音樂等同為人類高尚快樂之源泉。他竭力主張減少授課鐘點，印一個學生可以遵行的文學書目，請校內外名人作「文學名作講解」。如果這些美育措施能夠實行，「則清華學生塵喧遠耳，嵐翠在目，聽五音而視五色，左李杜而右荷莎，兼攝中西建築之英的勝地優游其中；然後就其所長，冥然獨往，以求達於渾圓的真理；那時精神教育可謂大功告成，我國的精神文明於是有所發揮光大的機會了。」

### 三 弘揚國文、中西並重的課程設置

清華課程的緊張、作業的繁重歷來是有名的，這從同學們課後去圖書館搶參考書的情景可以窺見一斑。對於學校整個課程的安排，諸如考勤的嚴格、考試的頻繁、淘汰率較高等制度提出異議的文章並不多見，但對於一些具體的科目，尤其是國文課程的設置，卻有不少批評的聲音。

這並不是說誰都認同清華的課程。朱湘這個未來的著名詩人，當時就視課程為「催命鬼」，非常不適應清華的制度。〈課程上前車之鑑〉<sup>⑩</sup>一文就表達了他對課程設置、授課方式等的種種不滿。「課程有用嗎？」文章劈頭就大聲喝問，它的功用無非是灌輸材料、整理材料、提問材料，對於學生創造性能力的提高，課程是無能為力的。他最難以忍受的是「課程將一個人的時間一齊霸佔住，使一個人的創造力無發展的機會，在這點上課程實在是罪大惡極」。他提出改革的意

見：大一的學生已經能夠自立，聽課來去自由，到期終交自修心得的報告以作成績；各科授課鐘點應酌量減少；課堂上不要都用於問答，應注重課外材料的介紹與整理材料方法的傳授，鼓勵課外調查，將餘下時間用於國文、英文的提高。他還建議國學從史學入手，增設《資治通鑑》課程，甚至連上課時間也都有推遲的提議。不能說朱湘的意見完全出於個人的考慮，雖然他後來因為曠課過多而被取消了學籍。

同學們比較集中的意見是對國文課程提出的。清華一開始是留美預備學校，對英文的重視遠遠超過對國文的重視，不但國文課程都安排在下午，考試成績的好壞不影響學生「放洋」，就是國文教授的各方面待遇也遠不如西文教授。上有所倡，下有所為，整個校園的傳統文化氣息相當淡薄，這引起了很多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學生的不滿。20年代上半葉的兩三年間，對這個問題有過集中的爭辯，為根本改變輕視國文的狀況起了促進作用。

1921年，聞一多在《清華周刊》上發表〈中文課堂秩序底一斑〉<sup>①</sup>，用充滿諷刺的口吻活靈活現地描述在國文課堂上的不正常風氣，他稱之為「同類的醜態展覽」：

先生：「今天要考了。」滿堂大哄，有的罵，有的笑，強狠的開門要走，和平的講這學堂從來不興月考。好容易經先生敷衍了半天，才慢慢地坐定了。先生把題目剛寫完了，屋後一個聲音叫道：「咳，混帳嗎！出這些題哪做得完？」

文章犀利地指出：清華的中文始終難以改良，「學校怕麻煩，教員不

自愛，當然要負一定責任，恐怕罪魁禍首還是這一般負自治的盛名的學生吧！」他們在英文課堂上講誠實、人格，到了中文課堂「便把那騙洋人的假面具扯破了」，露出囂張欺詐的嘴臉來。

王造時同學是對清華國文教育問題最為憂心如焚的一個。在〈劈頭一個問題——提高清華國文程度〉<sup>②</sup>一文中，首先揭示出清華的學生對中文教員諸多不恭敬，同時，批評校方對待中文教員招待之惡：「更是說來傷心，道來痛哭。」他痛心疾首於這樣的惡性循環：學生方面輕視國文教員—輕視國文功課—不讀國文書籍—不通祖國文字—與祖國斷絕聯繫—成為外國人；教員方面被輕視—灰心教授—潦草教授—貽誤青年—傷及社會。「我們若是不回國做事還可說，我們若是不用中國的錢還有理；既是要回國做事，又要用中國的錢，那麼老老實實，對於中文總須並重。」

同類的文章還有〈我為國文教員鳴不平〉、〈再論清華的國文問題〉、〈改良清華芻議〉等。1924年的《清華

清華一開始是留美預備學校，對英文的重視遠遠超過國文，國文教授的待遇也遠不如西文教授。王造時對清華國文教育問題憂心如焚，他批評校方對待中文教員招待之惡：「更是說來傷心，道來痛哭。」圖為1914年時清華中文部教員。



周刊》上有〈改良國學建議集成〉和〈清華學生國學調查〉，對此進行全面的總結。學生的呼籲，引起學校當局的關注，校長親自出面，作了關於減輕英文課程和加重國文課程的談話，校方也採取了具體措施。隨着國學研究院的成立，著名國學大師相繼來校工作、演講，清華的國文教學呈現出新的氣象。

#### 四 追求民主、獨立、自由和創新

清華自1911年建校、1928年正式成為一所大學後，在二十世紀30-40年代裏，與北京大學等一起，共執中國大學發展之牛耳。在相對短暫的三十年裏，清華崛起，一躍成為當時世界著名大學的奧秘何在？今天，儘管人們有見仁見智的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清華在其最初的三十年裏，尤其是在其30-40年代的二十年裏，從總體上講，把清華的建設和發展「定位」於現代大學的主旨，即不斷追求民主、獨立、自由和創新。

大學的民主是大學建設和發展的「空氣」。老清華的諸多刊物充分顯出清華校園中那種濃郁而深厚的民主氣息。不僅學生可以對學校的有關工作提出直接、中肯的批評、建議，而且學校實行的「教授會治校」等方針保障了師生共同參與學校的各項重要管理和決策。十分明顯，師生對學校的關心、呵護和熱愛決不只是體現在對學校的有關政策和措施的被動服從、一味退讓甚至阿諛奉承上，而是立於主動參與、積極批評和廣泛監督上。大學的民主與否，不只是體現並保護大多數師生的意志和利益，以及學校

的民主管理和決策，更重要的是，保護和實現少數師生的合理利益與正當要求上。例如，1931年，日後成為著名歷史學家的吳晗入學考試時文史和英語各得一百分而數學卻得零分，先被北京大學拒絕錄取，後由清華歷史系破格錄取，一時傳為佳話。

大學的獨立是大學建設和發展的「真諦」。清華由最初單純培養留美學生的學校，到中國人自己主辦的綜合性大學，再到一領全中國大學教育風氣之先的大學，這一過程既是中國近現代大學教育和大學學術趨向獨立的縮影，又是清華自身走向自立和成熟的標誌。從老清華的諸多刊物中可以看出，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裏，清華逐漸擺脫了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禁錮，掙脫了不同軍閥對清華的文化「蠶食」，削弱了國民黨一黨獨裁的「全能主義」(totalitarianism)文化政策，並且一直把大學的獨立作為奮鬥的目標和建設的主臬。例如，從老清華的諸多刊物中反映出清華初期師生對幾任校長的候選、任命和罷免的積極干預<sup>③</sup>，就是清華在二十世紀的八十九年歷史中絕無僅有的民主範例。

大學的自由是大學建設和發展的「精髓」。大學的自由是指在精神獨立前提下的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和創造自由，具體說來，是指從事知識創造、真理探索、學派風格確立和學者個性弘揚的自由。無數事例表明，這種自由是使大學能否真正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的首要條件，而且這種自由往往首先意味着大學教師和學生的人格自由。在中國，在大學，這種自由有否的問題直接面臨的是與現實政治的關係問題。在老清華的諸多刊物中充分表現出對於這種自由的追求和維護，其中，許多文章以不同方式來

大學的民主是大學建設和發展的「空氣」。大學的民主與否，不只是體現並保護大多數師生的意志和利益，以及學校的民主管理和決策，更重要的是，保護和實現少數師生的合理利益。1931年，日後成為著名歷史學家的吳晗入學考試時文史和英語各得一百分而數學卻得零分，先被北大拒收，後由清華破格錄取，一時傳為佳話。

共同表明這種自由不是依附政治，不是充當政治的附庸，而是在現實政治面前保持和發揚大學教育和大學學術的主動性、批判性和創建性。又如，30-40年代，清華廣大學生對於國民黨當局推行的「黨義」課程的批評和嘲弄；潘光旦40年代關於教育不是宣傳的一系列主張和文章；西南聯大時期清華教授對於國民黨當局企圖把清華教育加以「黨化」的抵制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清華大學比起其他大學來具有頗為顯著的自由特性和自由進取精神。這一點還可以從清華培養了和走出來一批非同凡響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學者的事實得以證明。

大學的創新是大學建設和發展的「本命」。沒有對知識的深化和創造，沒有對真理的發現和追求，大學的使命或功能則無從談起。清華在30-40年代之所以能夠立足於中國大學的前茅，還在於清華格外重視創新，即清華大力進行學科的建設和擴展，提攜學派的形成和紛呈，獎掖學者的探索和創造，凸顯大師的引導和影響，激勵學子的上進和深造，擴大中外學術的交流，放眼於世界著名大學的主流和經驗。清華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裏迅速成為中國數一數二並聞名於世的大學，的確是中國二十世紀教育史上的奇蹟。

毫無疑問，清華最初三十八年的經歷深深苦於國家的外禍和民族的內亂，致使清華昔日的教育輝煌和學術燦爛沒有連續不斷地保持下去。然而，清華的教育和清華的學術，源遠流長，即使經過了1952年中國大陸的大學及院系調整的挫折和1966-76年「文革」的衝擊，依然沒有乾涸，在90年代之際，開始匯湧，已成為二十一

世紀清華教育發展、清華學術創造以及清華學科建設「長河」的一個活生生的「源頭」。

### 註釋

- ① 王造時：〈清華校風的蛻化與批評〉，《清華周刊》，209期（1921年1月28日）。
- ② 梁啟超：〈清華底成敗與中國底安危〉，《清華周刊》，317期（1924年6月6日）。
- ③ 賀麟：〈新同學新校風〉，《清華周刊》，351期（1925年9月18日）。
- ④ 郝御風：〈清華之紀念〉，《清華周刊·二十周年校慶增刊》，1931年4月。
- ⑤ 陳銓：〈清華德育之回顧與今後之標準和實施〉，《清華周刊》，287期（1923年9月28日）。
- ⑥ 代中：〈我心目中的真教育〉，《清華周刊》，330期（1924年12月12日）。
- ⑦ 華：〈清華教育的兩層缺點〉，《清華周刊》，282期（1923年5月18日）。
- ⑧ 何鴻烈：〈清華當局和學生應有的覺悟〉，《清華周刊》，233期（1922年1月6日）。
- ⑨ 朱湘：〈精神教育〉，《清華周刊》，298期（1923年12月14日）。
- ⑩ 朱湘：〈課程上前車之鑑〉，《清華周刊》，296期（1923年11月30日）。
- ⑪ 聞一多：〈中文課堂秩序底一斑〉，《清華周刊》，214期（1921年4月1日）。
- ⑫ 王造時：〈劈頭一個問題〉，《清華周刊》，250期（1922年9月11日）。
- ⑬ 兩次「三趕校長」：第一次是1919年底至1921年6月的「驅張拒羅趕金」，即罷課趕走張煜全，拒絕羅忠誥上任，迫使金邦正辭職；第二次始於1930年，轟走軍事作風的羅家倫、拒武裝進校的喬萬選於校門外並逼其當場簽字「永不任清華校長」，師生請願趕走吳南軒。

大學的自由是大學建設和發展的「精髓」。在中國，在大學，這種自由有否的問題直接面臨的是與現實政治的關係問題。30-40年代，清華學生對於國民黨推行的「黨義」課程的批評；西南聯大時期清華教授對於國民黨企圖把清華教育加以「黨化」的抵制等等，都表現出清華有頗為顯著的自由特性和自由進取精神。

張玲霞 北京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